



新院士研修班学员回中科院考察

白春礼勉励他们“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

本报讯(记者丁佳)4月19日,中组部新当选院士研修班学员回中科院考察。中科院院长、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白春礼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白春礼表示,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在这个重要的时候,中组部组织新当选院士研修班非常及时和重要。

白春礼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中科院及院士们的期望和要求,特别介绍了近期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同志对中科院的指示。白春礼指出,新当选院士要立足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立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迫切需求,积极承担学部的学科战略研究、

咨询评议、科学普及与科学文化建设等任务,积极推动学部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到学部的自身建设中。

白春礼还就推动建设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维护院士称号学术性荣誉性和重视人才培养等方面,对新当选院士提出要求。他说,新当选院士要主动献策、躬体力行,积极参与学部工作,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要不断强化使命意识,把最高荣誉与国家责任对标,为推动国家科技智库建设贡献力量;要继续发挥学部优良传统,在咨询评议中做到立足科学依据、超脱部门利益;要有咨政报国的情怀,积极关注国家和政府部门的“急需求”,更多地解决“真问题”,提出“好点子”。

白春礼希望,新当选院士要淡泊名利、严于律己,特别珍惜称号荣誉,保证院士群体明德楷模作用。中科院院士这一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学术终身荣誉称号的纯洁性应该

受到每个院士的悉心维护,这是事关学部声誉的生命线。希望新当选院士能够严格遵守国家和所在单位的各项规定,严格遵守学部各项规章制度和院士行为规范,切实维护院士群体的良好声誉,不辜负党和国家人民赋予院士的崇高荣誉。

白春礼强调,新当选院士要提携后进、甘为人梯,大力培养青年人才,推动我国科技人才队伍良性发展。院士们都是各行各业的科技领军人物,在战略思维、学术造诣、教书育人、道德风尚等方面都经过千锤百炼,堪称为人师表。希望新当选院士能够按照国家和国家的要求,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举荐人才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重视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在自己的科研团队中建立合理的人才梯度,为中西部等人才缺乏的地区培养和推荐更多人才。

“学部是凝聚院士的大家庭,是广大院士

的‘娘家’。”白春礼希望,新当选院士能以中科院学部为家,增强主人翁意识,想国家之急、急国家之急,以“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的精神,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座谈会由中科院副院长、中科院信息技术学部主任李树深主持,中科院学部四个专门委员会向与会的新当选院士介绍了本委员会的工作情况,部分新院士进行了座谈交流。

座谈会结束后,新当选院士还来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参观物理所史馆和实验室,及与物理所老院士交流,大家对老一辈院士的战略眼光和胆识、谦逊平和的态度、提携青年的境界心生敬意,这些前辈为新院士树立了榜样。

52位新当选中科院院士,及中组部、中央党校、中科院学部工作局相关同志参加了活动。

本报讯(记者陈欢欢)4月19日,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一行来到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曙光)调研。白春礼表示,希望中科曙光围绕国家重大需求,超前布局、抓住机遇,发挥背靠中科院的科技优势,为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中国科学院“四个率先”如期实现作出新贡献。

白春礼一行先后参观了每秒万亿亿次超级计算机原型系统和先进微处理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并进行了座谈会。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军介绍了先进微处理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在高性能微处理器上的研制情况,和中科曙光近期在E级高性能计算机研制、雄安新区超算中心建设等方面的进展和人才队伍培养情况。中国科学院院士、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杰在发言中探讨了国产信息技术如何“两条腿走路”,最终实现自主安全可控的目标。

白春礼表示,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实现我国高端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一直是中科院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的方向,中科曙光围绕“率先行动”计划,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供给侧改革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努力,看到这些成绩,感到“非常振奋”。

对于中科曙光的未来发展,白春礼希望,第一,进一步考虑E级超算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的巨大作用,在E级机的研制中加强协同,与综合性科学中心、科创中心等创新资源形成合力;第二,积极参与京津冀协调发展,推动雄安新区超算中心建设,切实发挥好科技创新国家战略的支撑作用;第三,充分发挥支撑服务作用,积极参与中科院先导专项等重大科研项目组织实施,促进中科院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

中科院办公厅、重大科技任务局、科技促进发展局、科学传播局和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相关负责人陪同调研。

白春礼调研中科曙光

高端科普书20年

■本报记者 温新红

2018年4月23日,是第23个世界读书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将推出“第一推动丛书”的宣传视频,同时在各大网站上架25周年版套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知文库”将推出第100种图书;今年还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出版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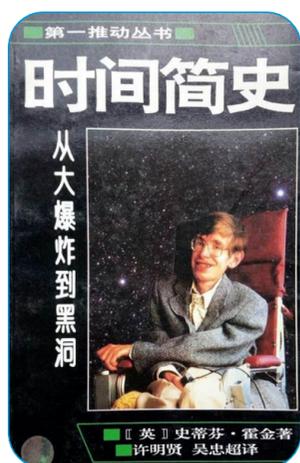
熟悉的名字让人们想起上世纪90年代的热潮,以“第一推动丛书”“绿色经典文库”“哲人石丛书”等大规模丛书为代表的高端科普书在国内兴起,并引起了很大关注。

现在,这些丛书中的还在继续出版,有的刚因各种原因在人们视线中消失。

这类书绝大多数品质高,不少已成为经典。无疑,它们的出版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科学的门,展现出与社科学文完全不同的视野。

20多年过去了,套用一句流行语,当我们谈起高端科普书,可以谈些什么呢?曾经的热潮,风光不再,叫好不叫座,还是这类书对中国读者的启迪和影响?或者,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些年高端科普书及其出版社在起伏的图书市场中经历了什么,处于什么样的境况,将来这类书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及多位出版人,回顾了分析高端科普书走过的路径及其出路。



郭刚制图

者,这套书源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些知名科学家和学者认为,对中国读者而言,了解国外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是一件很迫切的事,因此决定引进翻译出版一套能够反映科学前沿、启迪国民心智、倡导科学精神的科普图书。

“绿色经典文库”主编,当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清华大学教授吴国盛表示:“编辑这套文库的目的,在于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搜集在世界和中国环境运动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为我国广大读者提供一套基本读本,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一套权威的基本文献”。标准是思想性、可读性强但又经典和权威。

“哲人石丛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卞毓麟认为,科学可以是一个非常大的舞台。广义地看,现代社会中甚至很难找到与科学全然“不搭界”的领域。“哲人石丛书”的核心价值当然离不开“科学”二字,而对“科学”二字当然也必须作广义的理解。

清华大学教授刘兵曾主编或者介入过多套丛书,他说高端科普书的出版很难确认是什么时间开始,因为这类书一直都有零星出版。但是,大规模集中出版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个科学人文的热潮,“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有一个转折”。

刘兵还强调,不能说高端科普书取代了知识类传统科普书,而应该是不同类型的书都在实现各自不同的功能。以往人们更关注普及科学知识的著作,而恰在此时有了一个转变而已。

如火如荼

“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等是高端科普书的关键词,让这类书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和较高的知名度。

“哲人石丛书”另一位主要策划人潘涛就表示,第一本书一定要打响,作者一定要是诺贝尔奖得主,尤其在中国名气要大。

当时出版界的“黑马”海南出版社也把眼光投射到高端科普书。1999年出版了《银河系》(霍金的宇宙)。海南出版社编辑李继勇特意提到了2000年出版的《爱因斯坦的圣经》,

他说,选择这本书的原因,一是写得非常好,另一个原因是4位诺贝尔奖得主大力推荐,所以他们就第一时间抢下了版权。

刘兵也提到,这类书基本是引进的,原创的不占主导地位,只要图书主编或者编辑选书得当,质量是有一个基本保证的。

保证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翻译。李继勇介绍,因《爱因斯坦的圣经》一书原文语言诗意化,他们特意找了青年诗人马永波进行翻译。即便如此,翻译完成后仍然觉得不太满意,该书责编野夫又找了他的朋友李斯进行深度加工,经过近两年的打磨,才有了最终的优美文本。

不过,李继勇毫不讳言,他们也有失败的案例,约翰·格里宾的《寻找薛定谔的猫》的翻译就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的点名批评。“这算是当头棒喝,让编辑从浮躁中冷静下来,开始认真审视和思考科普图书的翻译出版工作。”

出版热,质量高,分析其原因,刘兵认为,一方面与整个学术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最直接的特点,这些书的出版与一批学者有关。也就是说,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相关领域的学者介入大众传播领域即出版中,因此,带来了出版的转折。

10多年后,吴国盛在《我与〈绿色经典文库〉》一文中,谈到了他主编这套文库的原因和经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自然’这个核心概念,我从自然科学基本概念的历史研究和哲学思考,慢慢延伸到现代性观念的思考上。很自然地关注环境问题、生态问题。”

吴国盛开列了22部著作名单,并且对每部作品都附了内容提要以及中英文的版权情况。

“哲人石丛书”是在当时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翁义主持下策划而成的。而这个团队最早的奠基者卞毓麟和潘涛,是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教科社的。

山重水复

虽然现在霍金以及他的《时间简史》几乎尽人皆知,不过,吴炜告诉记者,其实在推出之初却不被看好,因为“大家心里没有底”。事实上当时图书征订数字很差。

因着当时编辑李永平坚持,以及出版局及出版社领导的拍板,第一批书首印精装2000套,平装1000套才得以面市。

吴炜是1995年参与“第一推动丛书”编辑出版的,她记得这时书的销量才有了起色,也就是说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尤其是《时间简史》插图版出版后,刘兵为《时间简史》撰写的广告语“读霍金,懂不懂都是收获”,让其一时风头无两,成为超级畅销书。

从高端科普书的作者和内容来看,起点较高,读者定位一般是大学在校学生、中学和大学教师、科研人员。因此,高端科普书的销量不尽如人意。

“三思文库”的策划者、当时的江西教育出版社编辑黄明雨说,那时他经常会去小书店看书,“很少看到自己编的书。也就是说,我做的这些书在市场基本没有什么动静”。

“绿色经典文库”的发行也不尽如人意,除了《瓦尔登湖》和《寂静的春天》发行量稍好一些,其他书的印数都没有过万。吴国盛表示,这个印数与这些著作在西方国家的发行量根本不成比例。

范春萍是“绿色经典文库”的策划编辑,吉林人民出版社原编辑。她在回忆这套书时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和伤心,“被读书界誉为‘绿宝书’的‘文库’竟受到市场冷落”。

吴炜则表示,《时间简史》无疑是“第一推动丛书”中销量最好的书,也是因为有了它,他们“抢先一步占领了市场”。霍金的名气的确为这套书带来了更多的人气。

销量不佳的后果是,除了少数几套书至今还在延续,多数高端科普书不再出版,如“盗火者译丛”“科学大师佳作系列”“支点丛书”“三思文库”等。

但也有“逆势而上”的。200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了新版的“新知文库”,文库编辑之一徐国强介绍,出版一年以上的图书平均销量约为2万册。

在经过几年的沉淀和思考之后,2007年,海南出版社的“科普名家经典”出现在读者面前,这套书以经典和准经典的图书内容作为选择,整理日的读者已认可的图书,开发新的在科普领域有重要意义的作品,新旧搭配,形成市场认可的品牌。

李继勇表示这类书需要坚持和乐观,因为除了少数畅销科普书之外,大多科学人文类图书都处于不温不火的情况,许多从事科普出版的编辑也因看不到前景而转向其他图书领域了,但是,“因为起点本来就很低,销量总体还在逐年往上走”。

对于销量问题,刘兵的观点不在于一时的数据,他认为,有的书当时销量很大,没多久没人记得了,而高端科普书有普遍持续性影响,有的甚至超出了编者最初的预想,比如“大美译丛”中的《艺术与物理学》,在艺术界、美术理论领域的影响力,超过其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影响。

柳暗花明

谈到读者,现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的王世平说,实体店书繁荣之时,“哲人石丛书”销售情况最好的书店都在大学旁边,如复旦大学的鹿鸣书店、北大的风入松书店;再有就是人文氛围浓厚的书店,如季风书园、先锋书店等。在各类书展上,购买“哲人石丛书”最热情的群体,多数是在校大学生。(下转第3版)

周末聊吧

科学家为谁而鸣

■莫笑鸾

一瓶药酒,热闹了大半个中国。虽然还没有定论,但相信随着调查的深入,最后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

且不论,谭秦东的文章到底对药酒企业有多大的杀伤力,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因文入狱的经历将令谭秦东终生难忘。

在这次药酒事件中,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了我国法制建设和科学普及任重道远。同时,也看到了“知识的确可以改变命运”。

试想,如果谭秦东仅仅是一位普通民众,很难写出相对“有理有据”的文章,以善意提醒公众谨慎服用。当然,在事实调查清楚之前,我们尚不能将谭秦东贴上“知识分子的良知”“公民的责任心”等标签。

但笔者注意到,有媒体爆料出,有多名戴着诸多学术头衔的专家与药酒企业有千丝万缕联系。比如,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某教授常年发表诸如“保护鸿茅药酒等非遗传瑰宝不容篡改”“做好中华药酒文化的传承是鸿茅药酒发展的核心动力”等观点,而实际上,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该药酒企业董事;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蒙中医院某蒙医专家也是一直力挺“鸿茅药酒是蒙医瑰宝”,而他却是药企的股东之一。

于是,公众不免心生疑虑:我们到底还能不能相信所谓的“专家”?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永远是推动社会创新进步的助推器。相比普通民众来说,科学家作为掌握某一领域前沿知识的群体,他们的一言一行必然会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甚至会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如果科学家仅是从科学发声或者社会需求角度,阐释某种技术产品,或是支持或是反对,这样的做法值得鼓励。因为只有不同的观点充分交锋争辩,才会让真相愈显清晰。

而笔者所担心的是,有些科学家完全被企业所绑架,大肆鼓吹一些有利于企业产品观点,忽视产品的不利之处,甚至将“科学知识”沦落为企业的“来钱路径”,漠视了自身的社会责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是反对科学家与企业的结合,因为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企业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我们也一直倡导科学家要以国家目标和社会需求为导向进行科研活动,并且与企业建立多渠道、多样化合作方式,从而让先进的科技服务社会,让百姓也享受到科学技术的温暖。

科学家只有与企业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一味地偏袒或施压,从知识本身出发,实事求是地表达观点,让科学真正普惠于大众,这才是科学家应有的情怀和责任。